

# 我看到的和经历的

## ——阿富汗战地采访散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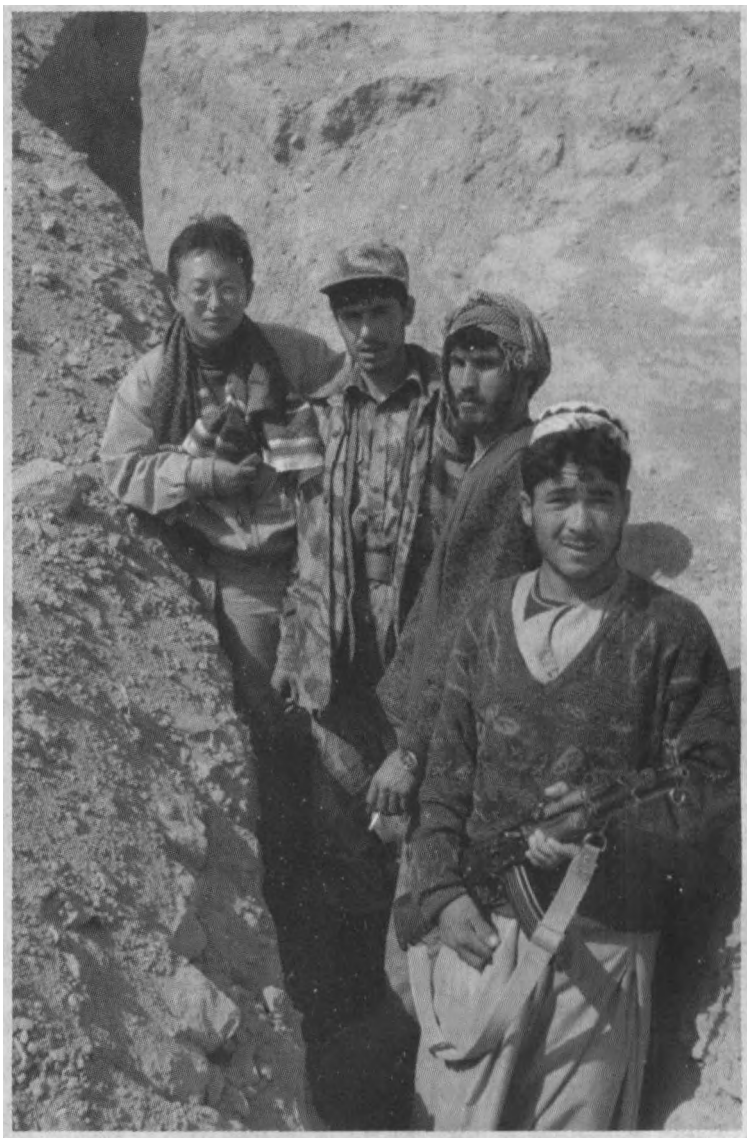
● 陈俊锋 ●

在大雾笼罩北京那天，  
我们开往阿富汗

战地记者总是穿行于炮火与硝烟中，用自己的汗水、泪水、鲜血去目击、体验战争及其酿成的苦果，甚至成为战争的牺牲品。但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任务是向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再现战争的进程，传递亲历的战火的残酷与苦难后的感受。正如俄罗斯战地记者在寄语他们国内的读者和观众时说的：你们在后方从媒体上看到的，正是我们所正在亲身经历的。在阿富汗这次采访正是如此。由于常年战乱，其领土上被各派武装埋没了4000多万枚地雷。记者在采访途中一定要沿着有人走过的路走，在雷区则要踩着别人的脚印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雇用可靠的当地向导。如果开车途中路遇拦车、搭车的人，绝不能减速或停车，而应该尽快通过。

在前线阵地采访，一定要问清楚敌方阵地的距离。如果距离比较近，千万不能站直身体。我在阿富汗北方联盟的阵地采访时，最近曾到达了距离塔利班阵地仅一公里的地方。我用肉眼可以看见塔利班的车辆，尤其在阳光非常好的时候，车辆玻璃窗闪着的寒光清晰可见。但是，对方狙击手通过步枪瞄准器可以毫不费劲地看清我，并且能有效地向我射击。在这种情况下，摄影记者冒的风险最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许多珍贵的图片都是记者拿生命换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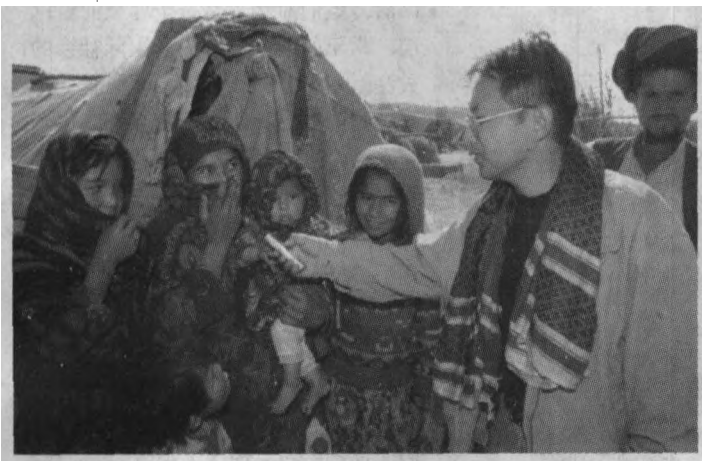
我们是第一批进入阿富汗的中国记者，从10月23日到27日进行了5天



陈俊锋在北方联盟的前沿阵地的战壕中采访

5夜的采访。我作为新华社派往阿富汗采访的记者小组组长，同另外两名同事一起，整理好行装，带上发稿用的便携电脑、卫星电话和相机，也带上了防

身用的防毒面具、钢盔和防弹衣。10月15日清晨，在大雾笼罩着整个北京城的时刻，我离开家出发了。先是取道新疆、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最后抵达



本文作者  
陈俊锋在  
阿富汗难  
民营采访

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在杜尚别，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可以办理合法签证进入阿富汗的途径。我知道这一趟采访将不虚此行。

#### 争取一切可能得到的帮助

在杜尚别，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由于赴塔采访的记者非常多，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宿问题。在中国使馆的帮助下，我们住上了塔首都三大旅馆之一的“杜尚别”宾馆。我们第一个采访对象是中国大使，外交官的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请他给我们谈了一上午，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情况。后来在我们办理赴阿富汗的签证时，由于我们的手续不全，中国大使馆给我们开了英文照会。中国使馆平时主要是开俄文照会的，但阿富汗使馆只认英文的。在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找来了一份“样板”，费了很大的劲终于为我们办妥了这事。这份英文照会受到阿富汗拉巴尼政权驻塔大使馆的欢迎，他们认为这是最有效力的证明文件。

同当地官员搞好关系，采访就有了保障。在去塔吉克斯坦前，我的一位记者朋友说他过去认识塔总统新闻秘书，但不知道此人还在不在这个职位上了。我就把这个官员的名字记下来。到了塔吉克斯坦后我通过一份周报，

了解到此人还在总统新闻秘书的职位上工作。我在塔外交部办理记者证的时候，又在那里打听到了他的办公室电话，并迅速同他取得了联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位官员在同我们未曾谋面的情况下就开始帮我们。他把他亲自手写的新闻稿及时文传到我们住的宾馆，令住在同一宾馆的外国记者大为羡慕。

在我们头一天去塔外交部新闻司注册时，我们发现新闻司副司长纳兹利耶夫表现出对中国人的友好感情，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把家里的电话都告诉了我们。在报道土耳其总统访问塔吉克斯坦时，这个电话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原来的记者现场采访名单中，没有我们的名子，通过这位朋友临时添上了我们的名字，并通报给了各个活动场所的警卫人员。使这次采访顺利成功。另一次是，采访第一架运送日本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飞机抵达杜尚别的报道。在9·11事件后，记者要想进入塔吉克斯坦的任何一个军用机场采访都是十分困难的。这次只允许日本记者和塔本国记者进入机场，别的外国记者一律不让进入。我们又向那位总统新闻秘书求助，虽然这些都没能起到实际作用，但我们赢得了时间。等到了前来为人道主义运送物资举行仪式的塔方紧急情况部的副部长。此人对中国也十分友好，并且多次到过中国。

们紧紧抓住他，请他务必说服机场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再三努力下我们终于进入了机场。采访到了第一架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日本飞机抵达的情况。

在俄总统普京抵杜尚别访问当天，我们在偶然的情况下碰到了正在休假中的塔总统车队的司机，我们当即果断决定临时雇用他，他在我们对普京进行跟踪采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带我们去总统车队，了解了当天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和联邦安全局长来访的情况，以及普京抵塔的时间。同时我们还通过车队的内线电话找到了正忙得团团转的塔总统的那位新闻秘书，并从他那里探听到普京在杜尚别会谈的计划，使得整个采访进行得极其顺利。

善于请求别人的帮助包括和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在去阿富汗的途中，我发现了我们的装备同外国同行的差距。生活用品上的差距就不提了，最令我羡慕的是外国记者带的小型发电机，我们去阿富汗路上最担心的不是战地的危险，而是没有电，发不出稿。当我发现有五个韩国记者带了发电机后，就一路同他们拉关系，看时机成熟后，就提出在没有电的时候能否用一下他们电的问题，他们爽快地答应了，还表示要向我们提供著名的韩国方便面。这让我非常感动，有他们的那句话，我总算稍稍安了点心。后来我们也帮了韩国记者的忙，在两名韩国记者因电话问题发不出图片稿时，我们在征得国内同意的情况下帮他们发了稿。

#### 战地采访，危险时刻相伴

在阿富汗采访的生活是危险、艰苦的。我们没有罐头，没有饼干，只有10个馕。这是从塔吉克的首都杜尚别买的。我们住的地方有供应饭的。有羊肉抓饭，有豆子熬成的糊，还有薄饼，但是数量非常少，四五十个记者只提供三盘饭，然后是两盘豆糊，而且5分钟以后就没有了。我们一般是白天出去采访，晚上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新华社三人记者在阿富汗北方的胡加尔巴霍金驻地的帐篷前合影(右为三人记者组组长陈俊锋)

▼ 陈俊锋以包为枕，躺在满是尘土的地上熟睡

当天采访的东西发出来。在这么繁忙的情况下，吃不上那里提供的饭，所以这10个馒头对了。在这些天，由于我们光吃馒头，加上气候干燥，现在我们的手上还在掉皮，每天掉很多皮。

在阿富汗，虽然我们没有遇到直接的生命危险，其实危险时刻伴随着我们。有五六个方面的危险。这里不妨稍说几例。第一个方面的危险就是我们去战壕采访的时候，我们经常离塔利班阵地很近的地方活动，在前线时我们遇到炮击，塔利班往我们站的地方打迫击炮，经验很足的北方联盟的战地将军告诉我们，炮声响了就没事了。那两声以后，战地将军马上让我们撤走了，这是在战壕的一种危险。我们租用的吉普车是苏联的老式吉普车。摄影记者需要随时停车，随时拍照，可每次停车就溜出去二三十米，我们以为司机对我们有意见。但当我们在撤离阿富汗的前一天，我试了试吉普车，原来没有刹车，下坡时就非常危险。所有的记者都带着美元现金，但那儿没有银行，不能用支票，也不能刷卡。现金带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那些当兵的都非常穷，有些都是为了钱来打仗的，纪律非常松散。如果当兵的要把你打掉，也就听天由命了。

在阿富汗，我们还遇上了一种危险，那就是污染问题。我们的驻地在阿富汗北方的胡加尔巴霍金，这个驻地

的上游有一个一万多人的难民营。难民营的环境非常差，排泄物都是直接排入河水里。到那儿以后，我们只能用难民营下游的水，用它刷牙洗脸。喝的水虽是烧开的，但是仍然不安全，外国记者自带饮用水，都不喝那个水。最后还有一个危险是，我们经常同外国记者在一起采访。其中有美国、英国的记者，他们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最近接连发生记者遇难的事，令人痛惜。

在这段日子里，使我们感触最深的还是那里的难民。在难民营里，我们接触了老人、孩子、男人和妇女。我们发现，他们谈到家人死亡时，眼中都没有泪水。我们采访一个10岁的孩子，他说起前天炮弹炸死了他的父亲和哥哥像说别人的事。他自己被炸掉了一条右腿，生殖器也炸坏了，腰间拴个尿袋走来走去，说起话还笑呢。有一个12岁的女孩，得了疟疾无药可治，在一点点的等死，说起这些她很漠然，那双眼睛里流露出了哀伤和无助。我给她一块大白兔奶糖，她舔了一下再包上，另一个孩子把咬剩的一半给了旁边的弟弟，看着弟弟怎么吃。这些景象令人心痛，让人流泪！

阿富汗打了20多年的战争后，国家完全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这是一个部族纷杂，军阀众多的国家。我们采访的每300人中就平均有一个将军。老百姓对外界都不了解。“9·11”事件

以后，他们对和平是寄予厚望的。以前，常年的战争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不同，国际社会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阿富汗，这使阿富汗的老百姓看到了和平的希望。从他们的市场上也反映了这个现象，阿富汗货币“阿富汗尼”在市场上，轰炸前跟美元比价是14万比1，轰炸以后，最高达到8万比1，老百姓觉得有盼头，有希望。他们对于美国给予厚望也好，对于国际社会给予厚望也好，对于饱受战乱的老百姓，他们的这种希望是能让人理解的。

在阿富汗，跟外国记者比，我们有优势。第一，我们吃苦耐劳。在北方联盟的新闻中心工作到最晚的记者是我们中国记者，一般都是凌晨2点到3点，那时候外国记者都睡了。第二，我们配备的设备是一流的。我们摄影记者的相机，全球就50几台，是最新最好的数码相机。我们携带的海事卫星的速度，传一张普通照片是十分钟，150万汉字的数据量，它的速度甚至快于北京市内的电话交流。第三，我们中国记者跟人相处非常亲善。虽然我们钱带得不多，但是我们还尽量给别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如果说有什么差距的话，西方记者更关注的是炸弹落在地上的那种烟尘，他们认为这很威武，尤其是美国的记者。他们把关注重点集中在怎么打塔利班，怎么轰炸这方面，别的西方记者也一样。他们甚至愿意去拍那些破衣烂衫拿着枪的士兵，拍他们打枪打炮。我们除了关注战争以外，还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战火下老百姓的生活，传递出一种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和西方记者关注点不一样之处。我们不希望世界上有战争，真的不希望有“战地记者”这种职业。但是只要有战争，我们作记者的还是要去采访的，尤其是通讯社的记者。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心中的痛。□

(作者单位：新华社国际部)